

·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奇异的国度：
耶稣会适应政策
及汉学的起源

[美] 孟德卫 著

[中] 陈 怡 译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奇异的国度：
耶稣会适应政策
及汉学的起源

[美] 孟德卫 著

[中] 陈 怡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美]
孟德卫著;陈怡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47-5858-4

I. 奇… II. ①孟…②陈…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中
国—明代②汉学—研究 IV. B979.2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332 号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霍红琴 裴红燕

封面设计 王晶晶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谨以此书献给我生命的意义所在

——女儿丽莎·安和儿子麦克·坎贝尔

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写在《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
及汉学的起源》出版之际

对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经渐渐地热了起来，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人们追踪这段历史时很自然要集中到这一时期，只有在 1500—2000 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质才会显现出来。在中国融入世界的今天，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重新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时刻，回顾中西初识的历程，梳理近四百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更多的历史智慧启迪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如果从总体上简要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我们会发现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上。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晚明以后，对中国的研究都已经不能仅仅固守中国本土的传统，晚明所传入的西学已经成为揭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学术界在对“西学东渐”研究充满热情的时候，对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要相对薄弱一些，当然近年来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了一些，不过相比之下是无法和数量庞大的对“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较的。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提出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的研究。乍一听,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一时应者如潮。其实,这个所谓“汉学转向”的说法是很值得思考的。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学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应,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的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的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传入在中国的接受和反应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

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难，也有对研究者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而且，“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范畴，在学科分类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中国学者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二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不可和十多年前相比。^① 如果和中国学术界的“中学西传”研究相比，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对我们展开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

第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

①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王尔敏翻译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何高济翻译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史》、《大中国志》、《中国新史》，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耿昇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及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郑德弟等人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郭强等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吴莉苇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余三乐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钱林森等翻译的艾田浦名著《欧洲之中国》，丛林翻译的《中国来信》，杨保筠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潘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李岩翻译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等；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计翔翔的《鞑靼战纪》、《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为中心》，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吴莉苇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严建强的《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许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

中国学术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史》算起也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是近年来比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对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的个案研究在今后若干年内恐怕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虽然涉及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学的几章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一条逻辑的思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苇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无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地深入研究,是放入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研究的。她和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上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跨度要比孟德卫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来说,孟德卫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图景。

第二,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进行了较好的结合。

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之,如果没有宏观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的,通论性著作出得人眼花缭乱。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产生于初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的研究上,以及在对柏应理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着一个学术进展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但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又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璁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虽然对学术也有推进,但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第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

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入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一种更为谦和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书中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很好地揭示了基歇尔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一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入论述。

又如对欧洲早期对汉语热情关注的分析。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

在 16—17 世纪对普遍语言学向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 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之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提到了汉语,但对 17 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三

在对 1500—1800 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中文。虽然现在欧洲的汉学家在独立地编辑藏在欧洲的一些中文文献,但在对文献的理解上和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发掘上,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展开研究是我们所应长期坚持的。

但从耶稣会士来华后中国的历史就不仅仅存在于中文文献中,它同时存在于西方语言的各类文献中。对晚明史和清史的研究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中文文献。近年来笔者走访了一些欧洲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地方所藏的中国明清史料的数量实在是我想象不到的,这些材料既有传教士的报告,也有商人的记载和外交使团的报告。任何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些外文文献的轻视都是不对的。旅居葡萄牙的中国学者金国平先生认为:“从目前的学术发展来看,将

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一手史料引入南明史的研究势在必行。长远而言，它将决定性地为明、南明、清史研究开拓新的观念、视野和空间，对新清史的编写也大有裨益。鉴于它是一种非传统史源，我们必须史料的分类上，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作为正史辅助学科，使其具有学术独立性，不局限于中外交流史范畴而进入正史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建议探讨是否可以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②我完全赞同金国平先生的建议，虽然自清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编译组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此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但仍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对这些藏在西方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献应该从长计议，作为一个国家学术事业，培养人才，制定规划，一步一步地展开。在这方面日本学术界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目前对大航海以后西方文献中日本文献的整理和翻译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完全无法相比的。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学术是急不得的，对基础性的外文文献要下力气去翻译和整理，这将会从总体上推进学术的进步。我们只要提一下金国平和吴志良近年来的澳门研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没有他们对葡文文献的基本整理和介绍，我们今天的澳门研究，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十余年来沉下心来做基础性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对重要的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做介绍和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年青的一代在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翻译译本也出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学术界的热心之人也给予了我们批评和帮助。学术乃天下公器，只要别人批评得对，我们都一概接受，为此，海外汉学中心不久会在自己的网站上专门开设对我们出版物的批评专栏，欢迎学术界对这些译本展开批评，经过这样不断的批评使译本更为完善。

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我的研究生陈怡翻译的，她现在在上海

② 金国平：《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之初议”》，载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第283页，澳门成人教育学会出版，2004年。

交通大学任教,为翻译这本书已经做出了六年的努力,在这里我对她的认真和努力表示感谢。但同时,也必须说明,我们并不能保证翻译中毫无任何错误,只能说我们尽力了。我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在再版时更为完善。对汉学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比较高,但无论如何任何人的译本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众所周知,像傅雷这样的大家我们今天都可以找出他翻译的不足,更何况这些成长中的青年学者。我这样说,倒不是为我们出版的翻译著作的不足辩护,而是说在批评的同时要给予善意的理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北外海外汉学中心的这种学术理想一定会在学术界的关怀和帮助下得以实现。

张西平

2009年4月27日写于北京枣林路6号院游心书屋

定稿于2009年8月10日

 中文版序

[美] 孟德卫

1978年,我来到莱布尼茨的家乡——德国的汉诺威。距此大约300年前,这位伟大的博学家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汉诺威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莱布尼茨档案馆研究了馆内精心保存的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手稿、信件和藏书。他的藏书中有很多涉及中国的书籍,当时欧洲不少大思想家也都曾阅读过。这些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要数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从利玛窦神父开始,耶稣会士们就试图通过与儒学相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这种方式被称为“适应政策”。莱布尼茨和几位重要的在华耶稣会士有通信往来,其中包括北京的白晋神父。白晋在清朝的宫廷供职达35年之久,其间他教授了康熙皇帝几何学,翻译了欧洲使节的文书,还研习了中文经典。近代即便有了快捷的现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也没有哪个西方人像白晋那样在中国统治者的身边生活和工作过这么长时间。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学者们在长篇的信件中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信件在今天看来已相当于学术论文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和著作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作了最早的介绍和说明,这为欧洲早期的中国学(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写作《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以下简称《奇异的国度》)这本书的过

程中,我试图追溯汉学的起源,描述最早研究中国的早期汉学家。他们中有些是当时最有学问、最具探索精神的欧洲人。1984年,我再次来到德国,在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对中国又进行了一年的研究。莱布尼茨当年曾任该图书馆的馆长。

《奇异的国度》一书于1984年由斯图加特的Steiner出版社出版。当时在中国,“文革”的那种排外氛围正渐渐退却,中国又重新向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敞开了大门。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是因为当代人对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差异再次表现出了兴趣。在1600—1800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中国人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国政治与儒家道德的结合都表现出了敬佩之情。那时,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尚未抬头,西方人的优越感还没有对中西关系造成影响。令中国人蒙受耻辱的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还都是后话。

现在,两个世纪以后,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余孽已基本散尽,中国的“天命”再一次处于上升阶段。中国与西方重新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世界大国在竞争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政治与经济摩擦。《奇异的国度》在首版25年后迎来了中文版的出版,这说明该书的主题具有持久不衰的意义,也表明中国和西方正在迎来新一轮的伟大相遇。

耶稣会士、学者白晋神父曾得到翰林院学士韩葵(1637—1704)等中国人的支持。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张西平教授对《奇异的国度》中文版顺利出版给予的支持。让我用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所引的曾子之语作为中文版序的结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孟德卫(D. E. Mungello)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

得克萨斯州,韦科市(Waco, Texas)

2008年6月1日

导 言

我们可以将 17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看做一棵植物,共同的目的好比这棵植物的茎干,但是从同一茎干上却长出了各不相同的枝叶。本书追溯了这个有机体生长过程中一个分支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与欧洲人对中国所作早期研究(笔者将其称为“早期汉学”)的关系。笔者关注的重点是耶稣会的一支,它建立在由利玛窦神父奠定的基础上,并在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柏应理和白晋等神父的著述中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在耶稣会传教事业发展中,这条在中国开辟的路线能设身处地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并显示了其灵活性,笔者因此称其为“适应性的”(accommodative)或“耶稣会的适应政策”(Jesuit accommodation)。

耶稣会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但耶稣会成员普遍注重学术,这促使他们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他们在欧洲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以便取得欧洲学者和统治者对他们传教事业的广泛支持。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欧洲学者对中国这个奇异的国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 17 世纪的欧洲,这种广泛的兴趣与大胆探索的业余爱好相结合是很典型的现象。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当时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

词中,这个词就是“curious”^①。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curious”这个词几乎没有 20 世纪用法,即仅用来表示“引起人注意的”或“好奇的”这样的词义。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更接近于拉丁语中的形容词 *curiosus*,指通过苛细的准确性、对细节的注重和有技巧的调查才能得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对 17 世纪的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要了解它就需要最细致的调查,即有技巧、准确、重细节的调查。“curious”一词的这个意义对笔者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了耶稣会中那些具有学术头脑的、拥护在华适应政策的人和欧洲早期汉学家之间的历史性联系。

✍

17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称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

① 对 17 世纪 *curiosus* 和 *curiositas* 两词词义较近的学术研究比较有限,并多注意强调 *curiositas* 一词在其广阔的历史及神学背景下的概念,而不强调 *curiosus* (*curious*) 一词专门用在有关中国的严肃著作(比如本书中涉及的著作)中时的意思。有关 *curiositas* 这一概念的意义在古代和现代的区别,以及圣奥古斯丁对 *curiositas* 一词在神学上的反对,见 Henri-Irénée Marrou, *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 (Paris, 1938) pp. 148—157, 277—280, 350—352 & 473f. 有关 *curiositas* 一词词义的演变,见 André Labhardt, “Curiositas. Notes sur l’histoire d’un mot et d’une notion”, *Museum Helveticum* 17 (1969): 206—224. 若想了解 *curiositas* 一词在 17 世纪游记文学中的重要性以及 *curiositas* 的概念如何吸收学术潮流的变化从而在经济、宗教和学术领域获得更为重要的新地位,还有游记文学是如何使古希腊、罗马人的地理学等古代知识与新的大发现相适应的,见 Dieter Lohmeier, “Von Nutzbarkeit der fremden Reisen. Rechtfertigungen des Reisens in Zeitalter der Entdeckungen”, *Trier Beiträge* 1979, Sonderheft 3, pp. 3—8. 关于 17 世纪 *curious* 一词的意义从“人所感兴趣的对象”到“不同寻常的事物”所发生的演变(特别是在政治背景中),见 Gotthardt Frühsorge, “Exkurs: Curieus und curieuse Methode”, *Der politische Körper.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im 17. Jahrhundert und in der Romanen Christian Weises* (Stuttgart, 1974) pp. 193—205. 有关 *curiositas* 一词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发展,见 Hans Blumenberg, *Der Prozeß 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 (Frankfurt am Main, zweite Auflage, 1980)。

※ 旁码表示对应的原著页码,全书同。——编辑注。